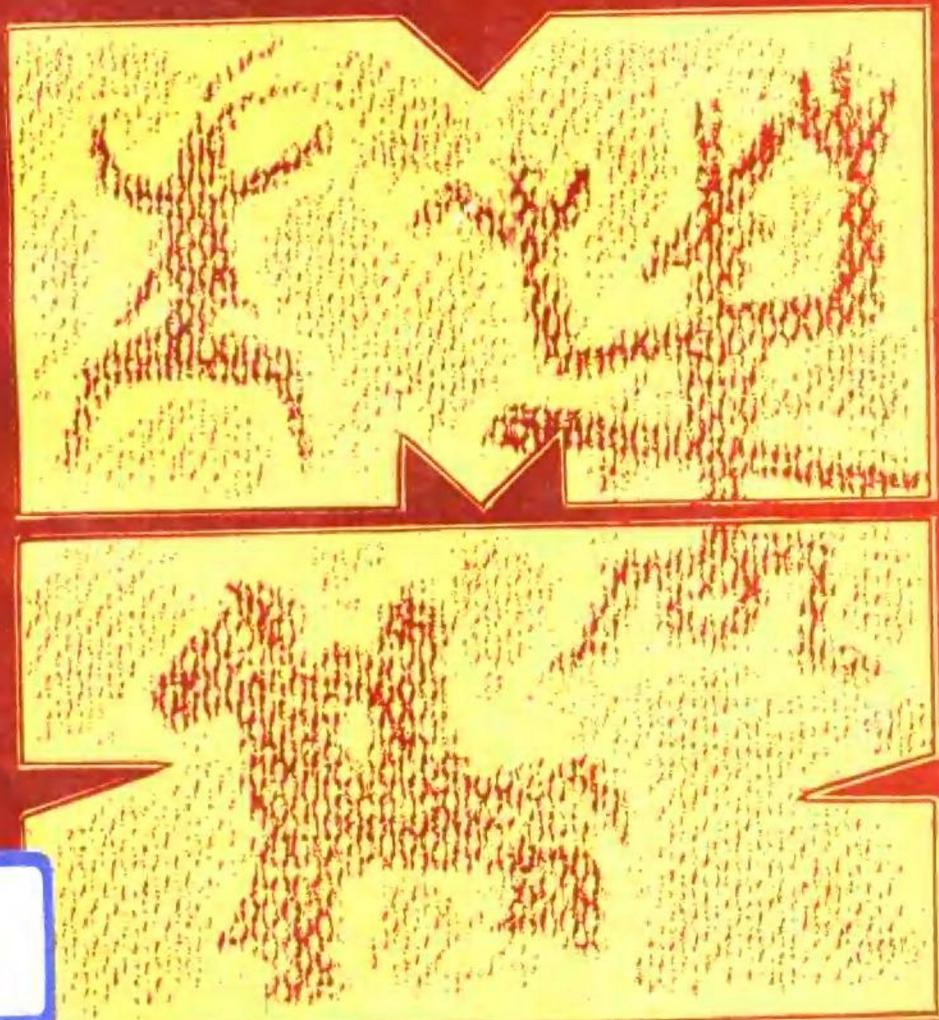


蒙 默

南方民族史论集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成都

(川)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 杨凌
封面设计 蒋光年
技术设计 席玮

南方民族史论集

蒙默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625 插页1 字数290千字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书号：ISBN7—5409--0840—8/K·78

定价：4.20元

**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科点专项
科研项目**



蒙默教授近照

目 录

僰为僚说

——兼论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与昆明	1
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	39
“僰人悬棺”辨疑	62
“蜀本无僚”辨	76
“湟中羌僰”史料考辨	89
先秦楚地濮人简论	93
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	100
传说中的彝族原始社会及其解体	117
凉山彝族“兹莫统治时期”初探	125
“白马番”渊源试探	158
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	168
唐宋时期“东蛮”族属的探讨	202
关于“沐川土司”一些问题的探讨	240
论苗族族源讨论中的西支来源说及有关问题	25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	273
也谈四川万县唐冉仁才墓	
——兼论巴东冉氏族属	306
宋思州田祐恭族属考索	314
苍梧、西瓯和与浒	
——侗族远源探索	324
扬越地域考	350
试论汉代“越巂”的“越”	355
南客小考	
——附论侗人之北迁	361
后记	367

僰为僚说

——兼论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与昆明



四川宜宾地区，汉朝时代有个僰道县，据说是古代僰人居住的地区。《汉书·地理志》犍为郡有僰道，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僰侯国也”。僰人早在秦以前就已和中原地区有着经济、文化联系，在古代文献中曾被多次提到。《水经注·江水》说：“（僰道）县本僰人居之，《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秦记》所谓僰僮之富者也。’”但由于古文献记载太略，没有留下可以作为民族识别的记录，特别是在后来的正史中长期缺乏僰人的记载，因此僰人的族属问题就成为一个长期没有取得统一认识的问题。有人说是氐，有人说是羌，有人说是僚族，有人说是白族，有人说是彝族，有人说仡佬，甚至还有人认为是被放逐了的华夏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由于僰道与凉山彝族地区密迩相连，因而僰人与古代凉山彝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探索凉山彝族古代奴隶社会中的民族关系时，僰人是必须涉及的一个问题，因而僰人的族属问题便成为应当解决的先决问题之一。自己不避浅陋，准备在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向读者请教。

一、释僰诸说质疑

上述关于古代僰人族属的各种说法，虽也各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深入分析起来也都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准备在正面提出僰人族属的看法之前先对各种不同说法作一个简略评议。

首先看看僰人是不是被放逐的华夏人。

上面谈到，汉代僰人居住的宜宾地区叫“僰道”。按汉王朝的制度，“县有蛮夷曰道”（《汉书公卿百官表》），僰道一名本身就说明了那里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同时，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僰，犍为蛮夷，从人，棘声。（第八篇）”

很清楚，“僰”是当时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称，怎么能说僰人是华夏人呢？至于《礼记·王制》所说惩处罪犯时所采用的“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的办法，完全是另一码事，与我们所讨论的僰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然，如果说“西方曰棘”是僰人，那么“东方曰寄”又是什么民族呢？显然是持此说者所难于自圆其说的。

其次，看看僰为白族或傣族说。

这两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现在云南省内的白族或傣族，自元明以来都常被称为“僰”。但我们知道，白族或傣族的名称很多，“僰”只是众多的名称之一，是来源于“白”或“摆”的异写；而且在元明以前，无论是白族或傣族，从来都不曾称为“僰”人。同时，白族是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的民族，傣族是壮侗语族傣语支的民族，虽然两族同属汉藏语系，但其差别还是很大的。如果仅从族称上来考察，那么，僰人究竟应当是白族呢？还是应

当是傣族呢？则又是持此说者所难于确定的了。

至于僰人是彝族的问题，其唯一的根据是《炎徼纪闻》中的这段话：

“僰人在汉为犍为郡，唐为于矢部，盖南诏之东鄙也。”

“……皆罗罗种也”。（见《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第42页引）

经查影印明刻《纪录汇编》中的《炎徼纪闻》，在《僰人》一节中根本没有“皆罗罗种也”一句。而且，这段记载中的前几句话也都是用来指示僰人所居住的地理位置的，“汉为犍为郡”，是说僰人在汉代居住于犍为郡境内；“唐为于矢部”，是说僰人在唐代居住于矢部地区。怎么能据此而认为汉代僰人的族属是“于矢部”所属的彝族呢？如再看看文中所载僰人习俗，“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数珠，持番咒祈祷辄验，多有削发为僧”，则这个僰人显然不能是基本不信奉佛教的彝族。

现在，再来看看僰为氐羌的说法，这是现时较为流行的说法。

持此说者的第一个根据是：“僰”常与“氐”或“羌”连为“氐僰”或“羌僰”，作为一个词汇，因此僰与氐或羌应属同一族系。但是，“僰”字也常有与“邛”或“蛮”连为“邛僰”、“蛮僰”等词汇（见《史记·大宛列传》、《史记·平准书》、《后汉书·种嵩传》、《续汉书·郡国志》、《汉书·王莽传》等），岂不僰又当与邛或蛮同一族系了吗？

持此说者的第二个根据是：南朝时期的徐广曾说过，僰，“羌之别种也”。但验核原书，也觉颇有问题。原文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集解》：“徐广曰：‘羌之别种也。’”

我们且从西汉时代的作品来检核一下僰为羌之别种的解释是否正确。《淮南子·齐俗训》说：

“羌、氐、僰、翟，婴儿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鞮，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

“象”和“狄鞮”都是“译员”的别称（见《礼记·王制》）。 “重象、狄鞮”是“几层翻译”的意思。《淮南子》的作者在这里是用文化、习俗（教化）的差异来说明其对语言差异的影响，他所举出的例证应当是在文化、习俗、语言等各方面的差异都相当巨大的、为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典型。而他所列举的这几个差异很大的典型恰好是当时的几个少数民族。像这样的典型少数民族难道能够是同一族系吗？而其中又恰好举列了羌和僰，因此，徐广的僰为羌之别种的解释显然是不足为据的。

至于僰为仡佬之说，过去曾有人提出过。他说：“僰乃另一种族，与今日贵州之仡佬、云南之僰子同种，非摆夷也。”（见《边政公论》第二卷第3、4、5期合刊）说古代的僰不是傣族（摆夷）是对的，但又说僰与白族（僰子）同种就不对了。同时，又对僰与仡佬同种的论点缺乏史料上的论证，因此这一说法不曾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们同意僰与仡佬同种的论点，并将在下节中提出我们的看法。

最后，顺便提一下僰为僬侥说。此说出于元朝周致中的《异域志》：

“僰人，名僬侥，按许氏《说文》曰：僰字从人，其人在四夷中为最仁（原误为生字），居坤地，颇顺其性，故名以人字傍名之也。”

周氏之作本为杂抄诸书，此条更是误读许书，殊为可笑。许书原文如下：

“羌，西方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西南僰人、僬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惟东夷从大，大，人也；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

(《说文解字》第四篇)

许慎在《说文解字·虫部》说：“蛮，它（蛇）种，从虫，蠵声。”“闽，东南越，它种，从虫，门声。”正是上揭“南方蛮、闽、从虫”的许氏自注，显然“闽”、“蛮”当各是一族。同理，《说文解字·人部》说：“僰，犍为蛮夷也；从人，棘声。”“侥，南方有焦侥，人长三尺，短之至也；从人，尧声。”也正是上揭“西南僰人、僬侥，从人”的许氏自注。僰人、僬侥显然也当各是一族。周氏“僰人名焦侥”之说，无疑是误读许书。

二、僰为僚试证

下面，我们准备提出关于僰为僚说的初步看法。

我们在前面曾说过，《淮南子·齐俗训》把羌、氐、僰、翟四个民族认为是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在文化、习俗、语言等方面都差别很大的典型例证，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这几个民族有着比较清楚的共同认识。因此，当探索古代宜宾地区的僰人的族属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妨先从汉代其它地区的僰人的记录着手。

《汉书·王莽传》载：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政权在遭到各族人民的反抗，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时候，曾经下诏书说：

“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殄破，……”

这里的“胡虏”是指匈奴。王莽在夺取刘汉政权之后，大搞大汉族主义，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后又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匈奴发兵扰边，成为王莽政权的重大威胁。在诏书里与“胡虏”相提并论的“蛮

“僰”，无疑也是当时反抗王莽政权的一个比较强大的少数民族。当王莽政权每况愈下，为了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而颁布大赦令以笼络人心时，把“胡虏”与“僰虏”的首领与刘𬙂（刘秀之兄）同置于“大赦令”之外，《王莽传》载：

“（地皇三年）大赦天下，然犹曰：‘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及北狄胡虏逆與，洎南僰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

这里的“南僰虏”显然就是前揭“诏书”中的“蛮僰”。这里点出了南僰虏的首领的名字叫“若豆、孟迁”，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索僰人的住地和族属的线索。

《汉书·王莽传》载：天凤六年（公元19年），“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征还。更遣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蜀吏人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

这个起兵反抗王莽的若豆，显然就是王莽认为十恶不赦的南僰首领。同时，这个南僰是居住在益州郡地区。《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所属有胜休县，“莽曰胜僰”。应当是王莽曾战胜居住在这里的僰人，故改名以资纪念。《读史方舆纪要》说汉胜休城在临安府南，清临安府治今通海县。《读史方舆纪要》又说，临安州为古句町国。这说明，古代僰人与句町国有关，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前揭《王莽传》载天凤六年遣郭兴“击蛮夷若豆”，而同传在两年后的地皇二年却又说是“郭兴击句町”。显然“击蛮夷若豆”和“击句町”就是一回事，一个是记人名，一个是记国名，若豆可能就是句町的首领。前揭王莽诏说若豆是南僰的首领，正

说明句町国是由僰人建立的。

再从《汉书·王莽传》和《西南夷传》来看，王莽时在西南地区的战争，其主要对手就是句町。句町是汉代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一个较强大的集团，在汉设郡县之后，句町首领被封为句町侯，昭帝时升为句町王，拥有云南东南红河以东地区和广西的西北角地区，土地辽阔，力量强大。但在王莽的大汉族主义政策下，在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的同时，贬句町王为句町侯，导致了句町的不满。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牂牁太守周歆杀害句町王邯，邯弟承又起兵攻杀周歆，于是开启战端。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征还下狱死。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击句町，颇斩首有胜（改胜休为胜僰可能就在这时）。莽征丹、熊，丹、熊愿益调度，必克乃还。复大赋敛”。（《汉书·王莽传》，下同）。六年，“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征还。更遣复位后大司马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地皇二年，遣“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曹放等击贼不能克，军师放纵，百姓重困”。王莽政权直到地皇四年彻底垮台之时，也没能够完成其“绝焚”句町的“大业”。只有这样的句町才配得上和匈奴相提并论，也只有这样的句町首领才会被王莽当作“十恶不赦”的“大罪人”。因此，我们认为，《汉书·王莽传》中的南僰，具体说来就是句町。

现在，再看看《华阳国志》的记载。《华阳国志》根本没有记载王莽时关于句町的问题和南中地区的战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南征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分建宁（即益州）、牂牁置兴古郡”。兴古郡领十一县，胜休、句町等县都在兴古郡。又载：“句町，故句町王国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说明西汉时期的句町王国，至晋时仍然存在，而且这个王国是由濮人建立的。我们认为，建立句町国的濮人，

就是《王莽传》所说的南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恃君》说“僰读为匍匐之匐”，匐属敷母，为轻唇字，古无轻唇音，当读为滂母，正当读濮。《路史·国名记》直读僰“音朴”，是完全正确的。僰、濮两族同住一地，僰、濮两字音读全同，其为同一族称之异译是无可置疑的。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兴古郡“多鳩獠濮”。鳩獠濮当然是濮人，又说“濮”是一个民族集团的名称，则“鳩獠濮”应当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名称。兴古郡的这个鳩獠濮，有时在文献中又直接被称为獠。如《三国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载：“牂牁、兴古獠种复反，（马）忠令（张）嶷领诸营往讨。”《太平御览》卷356引《广志》说：“僚在牂牁，兴古，……。”大概在晋宋时人看来，獠、濮是一族之异称，有时称獠，有时称濮，有时甚至连称“獠濮”或“濮獠”，都是一样。《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载夜郎竹王兴于遁水及汉杀竹王的故事，完全是抄自《华阳国志·南中志》。《南中志》载竹王死后，“夷濮阻城，咸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嗣……”。《后汉书》却写作“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后汉书》在这里改“夷濮”为“夷獠”，正是晋宋时人以“濮”、“獠”同义可以互换的最显著的例证。大概在晋宋之后，濮称便逐渐淘汰而代以獠称了。但称獠为濮的古称，在贵州彝族中却长期保留下来。纂成于清代前期的老彝文经典《西南彝志》等就是统统用濮称呼仡佬的。

在唐代，兴古地区的濮人，仍以獠的名称被记录下来。张九龄《曲江集·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中，载有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獠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谷悞等。方国瑜先生认为这几部所居当在接近安南之地（见《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三册）。《新唐书·地理志》载由安南入云南之途程说：“安南经交趾太平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

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百里至忠城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宋贵州，又四百里至甘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步涌。”尤中同志认为自峰州至甘棠州一段就是今河口至蒙自一段，所谓“生獠”，也就是张九龄所说的“獠子”（同上）。元代这个地区的獠人，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称为“秃落蛮”，也就是明清文献中所载滇东南一代的土獠。《皇清职贡图》说：“土獠，一名土老，亦名山子。相传为鳩獠种。……散居临安、徽江、广西、广南、开化、昭通等府，与齐民杂居。”（《续云南通志稿·种人志》引）这些地区的土獠，就是现在滇东南地区的仡佬族的先民。但他们既“与齐民杂处”，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地方志中也多有“渐慕华风”，“语言服饰近汉”等记载（同上书引），因而到了近代，还能保留仡佬族语言习俗的人数已不多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滇东南地区汉代的僰，就是魏晋时代的濮，也就是后来的獠（仡佬）。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地区的僰人。

《通典·州郡》和《新唐书·地理志》都载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开南蛮，置僰州”，四年改为南州。唐南州为今南川县（或云綦江县）。《太平寰宇记》卷136引唐《十道记》说：

“自江津路南循僰溪，水路二百二十里至南平州。”江津即今县，僰溪即今綦江，自贵州桐梓经綦江至江津入江；南平为今綦江之赶水。南川县东部有河名水江石，流入涪陵县大溪汇于乌江。据《涪陵县续志》载，大溪河上宋代有“僰人桥”；大溪又名白水，显然当为僰水之讹。南川、綦江、江津几地毗邻相接，而又都有以僰命名的地名，显然当因其地有僰人居住之故。但是，据《太平寰宇记》卷122引唐《九州要记》载：

“（南州），僰溪生獠招慰以置之。”

僰溪住的獠人，而且也正是在招抚了这些獠人的基础上建立

的南州，然而在建州之初的命名却是楚州，这就说明在当时看来，
楚就是獠，獠就是楚。

这一地区所居住的獠人，唐宋时代称之为南平獠或南平蛮。《新唐书·南蛮传》载：南平獠“人楼居，梯而上，名干栏。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于后。……男子左衽、露发，徒跣”。《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熊本疏称：南平地区“夷人居栏棚，妇人衣通裙，所获首级多凿齿者”。说明当时所保留的獠族习俗还相当浓厚。但自北宋王朝在此建立南平军后，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了。到南宋后期，真德秀就已称赞：“南平，故汉巴渝地，至唐犹以獠名，我朝元丰中，声教远浃，始即其地置军焉。百三、四十年间，浸以道德，薰以《诗》、《书》，斌斌然与东西州等矣。”（《鹤山先生大全文集·送南平江守序》）所以，在明清时代，这一地区已不再见獠人踪迹了。

应当指出，楚州之立虽在唐代，而楚溪之名则远在唐前。

《太平寰宇记》卷136 载：

“江津县，本汉江州县，属巴郡。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江州县自郡城移理僰溪口，即今理也。”

则僰溪之名远在南齐时代就已存在了。而僰人居此则又远在齐前。同时，南平獠居住此地的时期也当远在唐代之前。《新唐书·南蛮传》载：

“有甯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束，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

既在陈末以前已“世为渠帅”，则南平獠之居此当更远在陈前，大致与僰溪之名兴起的时代相当。这说明南川、綦江的僰人就是南平獠。

因此，我们认为南川、綦江一带的僰也还是猿。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古代宜宾地区的僰人。《华阳国